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研究丛书

主编 / 李剑鸣

土耳其共和国 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哈全安 周术情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丛书

主编 李剑鸣

土耳其共和国 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哈全安 周术情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 哈全安, 周术情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7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 李剑鸣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3261 - 6

I. ①土… II. ①哈… ②周… III. ①民主—政治制度—
历史—研究—土耳其 IV. ①D73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446 号

外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丛书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

著 者 / 哈全安 周术情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1.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261 - 6/C · 355

定 价 / 42.00 元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政治民主化问题》（项目批准号 04JJD770001）的成果之一

本书由（“985 工程”二期项目）
“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出版

出版说明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进入了全国高校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之列,并启动了每年一度的重大课题评审工作。我们申报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政治民主化问题”成为第一批入选的课题。在批准立项以后,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开始了具体的研究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产生了一批阶段性成果。2006年5月,在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支持下,课题组在天津召开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研讨会,除课题组成员外,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这次会议既是对课题组工作的阶段性小结,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会后,课题组成员再接再厉,又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最终的成果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小书。

政治民主化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往我们考察现代世界的形成和演变,比较注重经济的层面,重点讨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作用,通过阐释这些历史要素的作用,来展现地球上相对孤立隔绝的各个地区和人群,如何逐渐形成相互的联系,如何在交往、冲突和融合中塑造出一个愈益具有整体性的世界。除此之外,现代世界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在人口构成、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方面差异纷繁的众多民族国家,自18世纪末期以来纷纷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作为国家构建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因此,考察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传播、流变及其影响,考察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中

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其特征。

对于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们显然难以面面俱到，而只是选取了某些点来加以探讨。丛书的作者以课题组成员为主，也包括不少相关领域的学者。我们采用历史学的视野和方法，力图对世界历史中的“民主之旅”做一个梗概性的梳理，并对欧洲、北美、拉美、亚洲和中东某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做一点比较具体而深入的讨论。政治民主化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无疑是相当广泛的，我们选取这些点来讨论，主要是依据作者的学术专长。至于许多没有涉及的地区和问题，只有留待今后的努力。同时我们也相信，国内史学同行一定会不断推出新的论著，逐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李剑鸣

2009年1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引言 / 1

第一章 凯末尔主义的实践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成长

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与一党制政治框架的形成 / 18

1.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 18
2. 权力来源的转移 / 24
3. 一党政治的形成 / 30

二、国家主义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 39

1.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经济状况 / 39
2. 共和国初期的经济政策 / 44
3. 国家主义政策的影响 / 52

三、世俗化改革与社会的整合 / 59

1. 世俗主义改革 / 59
2. 土耳其社会的整合 / 63

第二章 多党制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

一、一党制的衰落与多党制的兴起 / 74

1. 共和人民党的危机 / 74
2. 民主党的权力之路 / 81
3. 民主党的十年 / 92

二、多党制的政治探索与政治动荡 / 104

1. 政党政治的发展 / 104
2.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 / 114
3. 多党联合政府 / 122

三、多党制的日臻成熟与政治稳定 / 129

1. 祖国党与土耳其的政治发展 / 129
2. “新联合政府时代”的政党政治 / 140
3. 多党政治的崭新局面 / 149

第三章 军人政治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

一、1960 年“革命”与民主制度建设 / 165

1. “新中产阶级”与民主党政府的危机 / 165
2. “五·二七”事件及其政治影响 / 176
3. 1961 年宪法与新的政权架构 / 183

二、“备忘录政变”与政府危机 / 193

1. 1960 年政变的遗产与军队的变化 / 193
2. 左派的兴起与德米雷尔政府的危机 / 201
3. 1971 年政变及其政治内涵 / 211

**三、1980 年的军事政变与民主框架的理性
收缩 / 221**

1. 9 月 12 日政变之前土耳其的政治危机 / 221
2. 1980 年政变与军政府的统治 / 228
3. 文官政治的恢复 / 234

**第四章 现代伊斯兰主义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
进程**

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文化复兴 / 243

1. 土耳其与伊斯兰教的历史联系 / 243
2. 伊斯兰主义文化复兴的主要内容 / 251
3. 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原因 / 261

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复兴 / 269

1. 伊斯兰激进组织与苏非教团 / 269
2. 第二共和国时期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
党 / 277
3. 繁荣党与美德党 / 287

三、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

完善 / 296

1.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新社会群体的成长 / 296

2. 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政治环境 / 305

结语：土耳其政治民主的进步

一 / 314

二 / 315

三 / 318

四 / 320

五 / 323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 325

二、中文文献 / 338

三、参考网站 / 341

引言

一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中东的北部，横跨亚欧两洲，包括小亚细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的色雷斯地区，北邻黑海，南邻地中海，西南濒临爱琴海，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希腊、保加利亚诸国接壤，面积约 78 万平方公里。安纳托里亚高原亦称小亚细亚高原，在地理上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区域，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高度约 1000 米，具有大陆性气候特征，降水量少，季节变化明显。高原北侧有克尔奥卢山、屈雷斯山、贾尼克山和东黑海山脉，均与黑海岸平行，统称为庞廷山脉。高原南侧为陶鲁斯山，山势陡直。沿海一带地势低平，分布着狭长弯曲的平原，具有地中海气候特征，气候温和，降水量适中。幼发拉底河源于安纳托里亚高原东部，土耳其人称之为非拉特河。著名的凡湖位于安纳托里亚高原东部，是土耳其境内最大的内陆湖。由于适宜的自然环境，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国，种植业发达。在沿海平原，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雨水的自然灌溉，农作物种类繁多。在安纳托里亚高原腹地，农业生产往往需要人工灌溉，普遍种植耐旱作物。畜牧业亦是土耳其的重要经济部门，安纳托里亚高原内陆的诸多干旱区域分布着广袤的牧场。

土耳其一词源于西方人的称谓。“几乎远自十一世纪土耳其人最初征服安纳托里亚那个时候起，欧洲人便一直把这块说土耳

其语的地方称作土耳其”。^①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于中亚草原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时期，统治阶层自称奥斯曼人，以示具有高贵的血统，至于土耳其人则泛指分布在安纳托里亚高原诸地和操突厥语的下层村民。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特指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民。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明确区分国籍与宗教信仰的差别，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非穆斯林国民中自称土耳其人者寥寥无几。^②

通常认为，安纳托里亚一词源于希腊语，本意是日出之处，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③ 安纳托里亚高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代赫梯人创造的文化遗存以及《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动人故事，诉说着安纳托里亚高原的尘封往事。透过古典建筑的断壁残垣，不难发现希腊罗马文化在安纳托里亚高原的斑斑痕迹。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安纳托里亚高原构成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缘，安纳托里亚高原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圣战的理想去处。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后，伊斯兰教自东向西逐渐传入安纳托里亚高原，基督教的信仰随之销声匿迹。

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城市，海峡东侧的城区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西侧城区则是一派欧陆风光，可谓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是古代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古城多处遗址至今犹存，拜占庭帝国时期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蓝色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宫交相辉映。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里亚高原中部，地处古代商路要冲，赫梯城市、罗马神庙和拜占庭城堡的遗迹以及塞尔柱时期建造的阿拉丁

①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② Don Peretz, *The Middle East Toda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p. 14.

③ 伯纳德·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

清真寺浓缩了往日的辉煌。伊兹梅尔位于爱琴海东岸，其前身是古代希腊移民城市士麦那，《圣经·新约·启示录》亦曾提及此处，现存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忒弥神庙遗址。

根据 2005 年的统计，土耳其共和国人口为 7208.3 万，^①是目前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沿海平原人口稠密，内陆高原人烟稀疏。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系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占全部人口的 90% 以上。库尔德人约占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 8%，亦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分布于安纳托里亚高原的东部，是土耳其共和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此外，土耳其共和国境内亦有少量的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尽管种族各异，目前土耳其共和国 98% 的居民操土耳其语。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分支，奥斯曼帝国时期采用阿拉伯字母，凯末尔时代改用拉丁字母。在意识形态层面，土耳其具有伊斯兰教的浓厚氛围。伊斯兰教传入安纳托里亚高原已达千年之久，源远流长。土耳其共和国超过 98% 的国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分别尊奉哈奈斐教法学派和沙斐仪教法学派；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信徒约占穆斯林人口的 10%，主要来自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

二

突厥人是阿尔泰语系的分支，包括东突厥人与西突厥人。奥斯曼人系西突厥人，属于西突厥人之乌古斯部落联盟（塞尔柱人亦属该部落联盟）的凯伊部落，曾经在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从事游牧活动，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3 世纪初，由于受到蒙古西侵的威胁，凯伊部落离开呼罗珊，迁至两河流域上游。凯伊部落在其首领苏莱曼死后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返回呼罗珊并依附于

^① “Year in Review 2005 Turke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7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07.

蒙古人,另一支在苏莱曼之子厄尔图格鲁尔率领下进入小亚细亚半岛西北部萨卡利亚河畔的索古德地区,依附于罗姆苏丹国。^① 1280年厄尔图格鲁尔死后,其子奥斯曼(1280—1326年在位)承袭父职,进而以圣战的名义袭击拜占庭帝国的边境,抢劫财物,拓展疆土。奥斯曼于1301年在巴法埃农击败救援尼西亚的拜占庭帝国军队,旋即被罗姆苏丹国的苏丹阿拉丁二世授予“贝伊”的称号。^② 阿拉丁二世死后,罗姆苏丹国分裂,奥斯曼遂改称埃米尔,创建奥斯曼埃米尔国。^③ 1326年奥斯曼死后,其子乌尔汗(1326—1360年在位)即位,移都布鲁萨。此后,乌尔汗兼并原属罗姆苏丹国的大部领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打开通向欧洲的大门。^④ 1346年,乌尔汗之子苏莱曼率军6000人开赴色雷斯,夺取伊斯坦布尔以北的黑海沿岸地区,是为奥斯曼人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⑤

穆拉德一世(1360—1389年在位)时期,奥斯曼人开始大规模进军东南欧地区。1361年,奥斯曼军队攻占亚德里亚堡,切断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联系,东南欧地区门户顿开。穆拉德一世遂将奥斯曼国家首都从布鲁萨迁至亚德里亚堡,亚德里亚堡改称爱德尔纳。1371年,奥斯曼军队在马里查河畔的塞尔诺文击败塞尔维亚人,迫使巴尔干诸地向穆拉德一世称臣纳贡。1389年,巴尔干诸地发生反叛,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匈牙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联军,在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统率下进攻奥斯曼军队。双方在科索沃平原展开决战,穆拉德一世与拉扎尔皆死于战场,奥斯曼军队

① I.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 p. 306.

② P. M. Holt, A. K. S. Lambton & B.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68.

③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144.

④ P. M. Holt, A. K. S. Lambton & B.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64.

⑤ Ibid.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① 穆拉德一世死后,巴叶济德(1389—1402年在位)即位。1394年,开罗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赐封巴叶济德苏丹的称号,奥斯曼国家随之由埃米尔国演变为苏丹国。1396年,奥斯曼军队在多瑙河畔的尼科堡击败欧洲基督教诸国组成的十字军,进而完成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仅余几座孤城,从亚得里亚海和匈牙利平原至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纳入奥斯曼苏丹国的版图。^②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指挥奥斯曼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③

苏丹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要表现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土兼并。1515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陶鲁斯山,攻入叙利亚,击败马木路克王朝的军队,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耶路撒冷以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17年,奥斯曼人的军队攻占开罗,马木路克苏丹统治下的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国家的版图,麦加的谢里夫家族以及希贾兹的贝杜因人部落随后宣誓效忠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④ 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即位后,奥斯曼人的军队在东部战场击败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吞并库尔德斯坦,占领伊拉克,兵抵波斯湾。1555年,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签署和约,确定扎格罗斯山作为双方的分界线。

16世纪堪称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东南欧与西亚、北非广大地区成为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属地,黑海和红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多瑙河、尼罗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则被视作奥斯曼帝国横跨三洲之辽阔疆域的象征。鼎盛的奥斯曼帝国,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统治的伊朗相形

^① P. M. Holt, A. K. S. Lambton & B.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74—277.

^② Ibid., pp. 277—278.

^③ Ibid., p. 295.

^④ S. J. Shaw and E. K.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3—85.

见绌。

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政体，苏丹的权位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继承原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凌驾于臣民之上，俨然是臣民的主宰者和保护者，是臣民忠诚的对象。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是辅佐苏丹的权力机构。奥斯曼帝国前期，苏丹亲自主持御前会议。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以后，御前会议由大维齐尔主持，苏丹改为垂帘听政。^①自17世纪开始，苏丹大都不再亲自料理政务，而是退居爱德尔纳的行宫，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转变为由大维齐尔主持的国务会议，大维齐尔的官邸即“最高波尔特”(the Sublime Porte)随之演变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象征。

奥斯曼帝国沿袭古典伊斯兰时代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采用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高权力。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尊奉正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正统伊斯兰教的哈奈非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自1566年苏莱曼死后，苏丹的统治权力日渐式微，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政治日趋腐败，后宫参政，苏丹更替频繁，政局动荡，内部冲突迭起。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于行省事务的控制不断削弱，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包括帕夏和贝伊在内的世俗贵族以及执掌宗教权力的欧拉玛往往各行其是，成为挑战苏丹统治地位的隐患。

自17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近卫军团

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与此同时，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联结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①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深刻的影响。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基督教欧洲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银币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货币形式。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廉价的白银，经欧洲大量流入中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所谓价格革命。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货币贬值，政府收入锐减。

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疆

^① William Ochsenwald,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4), p. 238.

地带，奥斯曼帝国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在于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土扩张。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订卡洛维兹和约，承认波兰对于乌克兰南部的统治权、奥地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统治权、威尼斯对于希腊南部的统治权、俄罗斯对于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卡洛维兹和约的签署，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对于基督教欧洲的军事态势由主动性的战略进攻转变为被动性的战略防御。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频繁交战，巴尔干半岛、黑海北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主要争夺目标。177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奥斯曼帝国丧失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穆斯林汗国的宗主权，支付750万阿克切的战争赔款，俄国获得多瑙河以及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运权，同时俄国政府获准向伊斯坦布尔派驻公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处于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① 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和疆域的接连丧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三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近代欧洲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形成的历史落差，改变着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着力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

1789年，正值法国革命爆发之际，塞里姆三世（1789—1807）继任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即位后，颁布诏书，实行新政，

^① Shaw & Shaw: *op. cit.*, p. 250.